



历史名人（四）

侯永华 主编

目 录

中国帝王将相传说（续）	1
李开先罢官	1
隆科多死因	4
年羹尧死因	8
海龄死因	11
王鼎尸谏	14
翁同和被罢官	17
赵舒翘死亡之谜	19
《李秀成自述》小考	22
石达开遗信	25
宋景诗投降辩	28
李纯死因	31
叶名琛被俘	34
邓世昌殉国	37
李莲英死亡之谜	39
黄兴易名	42
黎元洪封督	45
蔡锷出京	48
黎元洪床下藏身	50
宫崎寅藏	53
冯玉祥“贺寿送水”	56
张良	59
张良墓地	61
李广封侯	62
历史上的巨毋霸	65
崔浩被杀	67
“帝王”探源	70

三皇五帝	72
颛顼是谁	75
炎帝的故事	78
黄帝的故事	84
伏羲的故事	87
蚩尤的故事	89
女娲的传说	96
尧舜禅让	99
大禹治水	107
禹娶涂山女	111
夏启继位	114
暴君商纣王	117
武王伐纣	121
周武王在世时间	124
周公在家庭中的位置	127
西周时期的崇国地理位置	130
周穆王到西域	133
明景帝之死	135
紫禁城称谓的由来	138

中国帝王将相传说（续）

李开先罢官

明代著名文学家李开先是山东章丘人，为嘉靖八才子之一。嘉靖八年(1529年)中进士，接着即步入仕途，先后任户部主事、吏部考功司主事、太常寺少卿等。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四月，被罢官回故乡。13年的官场坎坷生涯，使他感慨万千，回到家乡就病倒了。故乡人的欢迎和安慰，使他从郁病中解脱出来，立即投入了文学创作。他的一生著作很多，主要有《宝剑记》、《词谑》、《闲居集》等。仕途的不幸，却使他在文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李开先是个清正有为、善于职守的朝官，在户部时“持法无挠”，在吏部时“谢绝请托”。他被罢官的原因，有其复杂的政治背景和人事纠葛。研究者见仁见智各有不同。

李开先罢官的直接相关事件是“九庙灾”。《明实录·世宗实录》记载：宗庙发生大火，火从仁庙延烧，仁庙及太庙、群庙一时俱烬。皇帝以为天降灾异是由于朝中出了奸佞，因而，令四品以上京官各自呈上一份辞职书，然后听由言官指实奏劾。李开先正好是个四品官，这时照例呈了“自陈”。结果，与吏部尚书许赞、右侍郎欧阳铎等12人一同被免职。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说他是“不满朝政，自请罢官”就是据此而说的。不少

论著都持这一说法。

李开先对自己的罢官则有不同的说法：他在《中宪大夫保定府知府右川康君墓志铭》中说“奉职无状”，即没有政绩而被免职。在诰《封宜人亡妻张氏墓志铭》中说：自己为人清高，性情好强，因而遭到排挤。

明、清人的记载也是莫衷一是。明人焦 纂辑《国朝献征录》中说，李开先以诗酒误事而招致罢官。明人过廷训《本朝分省人物考》说：李开先不能谄附权贵而被罢官。明人殷士儋为李开先写的墓志铭中说：有人对他不满而“媒孽之”，“柄臣”曾遣人搜罗他的“阴事”而无所获，以“他事”罢归。“他事”是什么，没有说明。清初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说：李开先性情耿介，得罪新贵而罢官。

有人指出：李开先在京为官时，虽也憎恨权奸，但在嘉靖八才子中，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个。他不像有些文章说的那样上书抨击朝政。他在京任职期间，未见有上疏议政之举，甚至在座师霍韬逝世后，因怕得罪夏言，竟不敢为其写墓志。只是罢官以后，才变得激烈起来，对居官时的懦弱也颇为忏悔。他在《寓言》诗中写道：“予昔居京太拘泥，怕参宰辅与达官。”

但是，有的研究者却把李开先的罢官归之于“弹劾夏言”，似乎有点溢美之嫌。中华书局出版的《李开先集》在出版说明中说，李开先自宁夏饷边回京后，看到朝政腐败，夏言内阁贪污无能……非常愤慨。凭着他的满腔正义，和他的朋友王慎中、赵时春一同参加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弹劾夏言。结果斗争失败，被削职为民。路工《李开先的生平及其著作》、宁茂昌《李开先及其文学主张》也说，当时宫中大兴土木，夏言、严嵩一味迎合皇

上旨意推波助澜。李开先眼看正是大旱之年，灾民流徙无所归，衣食无着，便抨击了夏言内阁，结果被罢官。

李开先文选司郎中时，不听夏言摆布，夏就调他为闲职；再不听，就借机罢免之。李开先与夏言之间是有矛盾的，罢免李开先，内阁首辅夏言是起了决定作用的。李开先自己也说：“虽出于内批，孰不知为权贵人所为？”这个“权贵人”指的就是夏言。在罢免李开先问题上，当时的内阁中也是有斗争的。李开先的同乡、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翟銮，即曾为他苦争，终因夏言势大，最后“力不能夺”，只好“垂泪从之”。

卜键在《关于李开先生平几个史实的考辨》一文中指出：李开先、夏言的矛盾不是忠奸之争，而是派系斗争。即便以传统的忠奸概念去衡量夏言其人，也不能简单地把夏言斥为奸佞。夏言自正德十二年中进士起，长期担任监察御史，颇能指斥时弊，弹谏勋贵，匡正冤案。在与郭勋、严嵩的斗争中，极为刚毅，甚具识见。在对待皇帝的态度上，也并非一味奉承。对世宗皇帝赏赐严嵩等水香冠一事，他曾上疏讽劝，几乎获罪圣上。在派系斗争中，最后他自己也终被吞噬，以 67 岁高龄被论斩弃市，结局非常悲惨。夏言与李开先的矛盾，是其与阁僚矛盾的正常外延。李开先的罢官，是统治阶级集团内部许次多权力再分配中的一次。李开先并非处处抗直拒上，他与朝中重臣多有交往，有的而且过从甚密。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倾轧，象一个巨大的涡流，把李开先卷入权力的中心，又极快地抛向水底。李开先的罢官，“九庙灾”是借口。所谓“他事”也是借口，唯有那不便明言的派系斗争或许才是真正的原因。

隆科多死因

清世宗初年勋戚重臣隆科多，身为总理政务大臣，兼吏部尚书加太保衔，承袭一等公爵，位高权重，备极尊荣。虽无什么德政，却不象明严嵩那样植党营私，专权误国；也不象乾隆时和坤那样贪婪枉法，罪积如山。然而下场却惨于二人，显赫两年多，遂削太保衔，如同充军。罚往阿尔泰划定边界赎罪。接着定 41 款大罪，险些身首异处，虽蒙皇恩免于正法，仍囚死在畅春园特别监房，计前后不满 5 年，仅如花昙花一现。《清鉴》说：“论者谓帝对于隆科多之加膝坠渊，不无有酬恩灭口之两种观念。”到底酬什么恩？灭什么口？至今是个疑案，值得加以评述。

原来隆科多是隆国维之子，满洲镶黄旗人，佟佳氏，清圣祖(康熙)孝懿仁皇后之弟，乃四皇子胤禛的元舅。圣祖临终前，他任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掌握京师警卫，在宫中侍疾。那时太子允禔乃被废，诸皇子争当皇位继承人。胤禛侧室福晋又是定川边、征西藏的川陕总督年羹尧妹，有郎舅关系；其时年拥重兵于西北，恰能牵制圣祖欲立为储的抚远大将军十四皇子允禵，于是胤禛与隆、年内外勾结谋夺储位。相传圣祖病中召允禵回京的诏书，就是被隆扣发的。故圣祖病笃时，仅胤禛及京中皇子在宫门外问安，隆科多独受顾命于御榻前，对于皇位继承人，圣祖亲书“十四皇子”于其掌。俄而圣祖崩，隆科多趋出，胤禛等迎问，隆遂抹去(或说舔)掌中所书“十”字，只留“四皇子”三字，恰于预藏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经窃改的御书黄绢“传位于四皇

子”（《清朝野史大观》）吻合，由隆宣遗命，胤禛得立，这就是雍正皇帝。

雍正即位初，倚畀二人甚殷。外升年官，笼络备至；内加隆爵，位极人臣。诏廷官凡奏章皆书舅舅隆科多，帝手诏亦称舅舅而不名，尊宠无以复加。有清一代，任用官吏不经奏请者，前后只有三人，吴三桂称西选，年羹尧称年选，隆科多称佟选。帝对隆所为，并不责怪。及帝位稳固，便不再宽容。先于雍正三年冬定年僭越谋叛等大罪赐死。时隆奉旨审年狱，只议免去年公爵，帝极不满，朝臣窥测帝用意，知隆末日已至，破鼓齐擂，交章奏劾，帝命把他下狱议罪，定隆吏部办事专擅、私抄玉牒、徇庇年狱，阴谋废立等大罪，应立斩。其实前三者乃顾命勋臣常事，训诫降职足矣，后者纯属捏造，罪何至死？据《清宫遗闻》载隆罪状有“仁庙升遐之日，隆科多并未在御前，乃诡称带匕首以防不测，其欺罔之罪二”。这才是症结所在。考隆科多抹掌拥帝登基事，清官书《起居注册》当然不会记载，仅系一种传闻，但并非绝无根据。且看都察院的关键狱词：“圣祖仁皇帝升遐之日，隆科多并未在御前”。既然如此，何以帝免隆斩刑谕旨却说：“皇考之遐之日，诏朕之兄弟及隆科多入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是大臣之内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特“免其正法”。前后自相矛盾，可见“欺罔”是假，抹掌拥立是真。

再说雍正嗣位，圣祖果真“面降谕旨”吗？也不尽然。帝即位才八月，便密封建储锦匣于乾清宫，当即召谕群臣说：“圣祖命朕缙承统绪，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卒之间，一言而定大计，薄海内外，莫不倾心”。“朕则不能及此也”，故“不得不预为之计”。可见帝继位，只凭

隆科多掌书“一言”，并无堂皇遗诏。而且据雍正亲信大臣张廷玉《自订年谱》称：建储密旨有两份，一份由帝存身边，以备紧急时勘对，防窃改密旨。足见帝不忘昔日隆密谋改诏事，怕人效尤。今隆功高，任用官吏专擅，帝看在眼里，犹如芒刺在背，不诛昔日知情人，心又怎能得安？

其次是雍正继承大统，果真名正言顺，“薄海内外，莫不倾心”吗？连帝也难自圆其说。《大义觉迷录》载：据曾静口供及清宫流放太监于义、何玉柱等散布流言：圣祖原传位十四阿哥，被皇上改“十”为“于”，因而得立。帝自辩只说“朕兄弟之中如阿其那(满语猪)、塞思黑(狗)等，久蓄阴谋，希冀储位”。“伊等若非亲承皇考付朕鸿基之遗诏，安肯帖无一语，俯首臣伏”？这全是欺人之谈。既有皇考遗诏，御制专书《大义觉迷录》，怎不和盘托出，申“大义”于天下，用确证以“觉迷”呢？正因空言无补于事，徒给人以口实，后来乾隆才把它列为禁书，不许流传出去。而且翻开清史看，允禔、田共、允禔、唐等何尝“帖无一语”？正因其不甘臣伏，敢揭帝与隆夺储密谋，最后才惨送性命，并敕改恶名为猪狗。

还有一件考官秘闻，可作为抹掌拥立佐证。《清史秘闻》载：雍正初年，吏部侍郎黄叔琳任江南考官，用《论语》中“或问禘之说……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全节命题，原属巧合。谁知言者本无心，听者却大有意。世传雍正得悉“指其掌”题目大怒，很快借故诛之。

但持异议者谓隆矫诏拥立信史无征，据《东华录》载：圣祖病笃曾诏诸皇子及隆科多至榻前面谕：“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

皇帝位。”当时世宗虽不在场，圣祖崩后始由隆宣遗诏，但此榻前位嗣是官书所载真事实。因此，杨启樵先生在《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中说：“康熙末年，佟氏一门(除隆外)，均为允禔田共之党”(《清代史》)。隆与世宗关系并不深，怎能冒险矫诏拥立？其时隆权贵已甚，任何皇子继位都会重用他，何苦出此险招立世宗？且助人篡位罪大恶极，怎保能塞众口？又怎能保世宗必无翻脸一天？若无榻前立嗣事实，仅凭隆一言，能令诸皇子心悦诚服吗？故世宗继位“内得力于隆科多，外得力于年羹尧”(《清代史》)的说法，流传虽广，但非最后定论。

然隆若无旋转乾坤的顾命殊勋，世宗怎会极口称颂隆“超群拔类”，“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掌故丛编》)？今忽由“加漆”而“坠渊”，倘非为了灭口，亦殊难理解。反对者谓世宗赞“功臣”，只是用权术笼络隆，别无深意，隆死是恃功骄恣所致。查雍正二年末帝曾批年折“人臣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文献丛刊》)。这对年、隆无异是“哀的美敦书”，惜隆当时不悟。隆在吏部办事时，“官吏铨考，任意引用(《清鉴》)，日无君主，先前圣宠方殷，故无人敢揭发；今帝因年狱得悉隆劣迹昭著，实出意外，引起厌恶心情，必然“返恩为仇”。何况世宗本是“喜怒不定”(圣祖评)铁面无情的皇帝，其长子弘时只廿三岁，已娶妻生子，因“年少放纵，行事不谨”之过，竟被削宗籍赐死(《清皇室四谱》)；对亲子尚如此，今隆专横触逆鳞，能幸免于囚死吗？

总之，隆与世宗恩怨关系，文献不详，疑窦乃生。或说隆败异乎寻常，与帮助“夺嫡”有关，今“鸟尽弓藏”，乃必然现象；或说世宗朝无专横之臣，隆恃功骄恣，

故为极端专制皇帝所不容，咎由自取。所说各有所据，不无理由，无确证论断前，正如《清鉴》评抹掌拥立事说：“存疑可也。”

年羹尧死因

年羹尧是清代康熙、雍正间人，出身进士，官至四川总督、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曾平定西藏、青海回民叛乱。雍正二年平定青海后，十月入京觐见受封。时功盖天下，位极人臣，受封为一等公，父亦封一等公加太傅衔，二子分封子爵、男爵，其家仆皆封四品顶戴副将，一时炙手可热，权势显赫。然不到一年后便被雍正皇帝尽削所有官爵，列 92 大罪，终赐自杀。年羹尧成败之速，异于寻常，被史家列为“雍正八案”之首案。然为何被杀，却众说纷纭，成为清史上一个颇有兴味之“谜”。

一些人认为这与雍正夺嫡有关，故杀知情者。不光是稗官野史，学者孟森的《清代史》、王钟翰的《清世宗夺嫡考实》都持此说。据说康熙临终时指定十四子胤禵题嗣位，四子胤禵真串通年羹尧、鄂尔泰、隆科多，矫诏篡立。其时十四子胤禵题在四川为抚远大将军，原可挥兵争位，然受制于川督年羹尧，遂无能为力。新君立后，为酬羹尧拥立之功，大加恩赏，然这不过是“迷汤”，实则对这些知情者已存杀心，最后终杀之。

有些人不同意此说。认为雍正初羹尧受宠，并非雍正先笼络而后杀之之由，而是皇帝对他效忠辅弼的奖励。他为其藩邸旧属，又有郎舅之亲，故常对他恩赏有加，这决非对他灌“迷汤”。且雍正继位时，他还在川平乱，

未参与焉，何以得知内情？故上说不能成立。

《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等作者，都认为年羹尧是恃功自傲以致被杀。《清史稿》载：“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傲，……入觐，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外，年策马过，毫不动容；王公有下马问候者，年颌之而已。世宗前，亦箕坐无人臣礼。”《清代轶闻》作者亦认为“年挟拥戴功，骄益甚”。且年残暴对待部下，任人唯亲，乱劾贤吏，引起公愤，也为雍正帝所不容，故被杀。

更有一说，认为年羹尧死是因为他自立为皇帝。乾隆时学者萧 在《永宪录》中提到：年羹尧与静一道人、占象人邹鲁都曾商谈过做皇帝的事。陈捷在《年羹尧死因探微》一文中亦持此说，认为“羹尧妄想做皇帝，最难令人君忍受，所以难逃一死”。而《清代轶闻》一书则记载了羹尧失宠被夺兵权后，“当时其幕客有劝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观天象，浩然长叹曰：不谐矣。始改就臣节。”进而认为这说明年确有称帝之心，只因“事不谐”，方作罢“就臣节”而已。

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主要是雍正为人阴鸷猜忌，不能容人，尤其不能容功臣。加之年羹尧自恃有功，言行不检点，雍正更不能容忍，在翦灭其兄弟胤禔、胤禩、胤禛后，借题发挥，以羹尧所上贺章字迹潦草，并把“朝乾夕惕”四字颠倒为“夕惕朝乾”作为借口，暗喻臣下劾奏，连降羹尧 18 级，罚至杭州看守城门，终罗织罪名，令其自尽，家产抄没入官。

到了近现代，各说众多，或认为年被杀乃“鸟尽弓藏”之必然现象；或说是主奴晨有旧怨在先，羹尧又恃功骄傲在后，使君主生疑、畏、厌、怒之心等等。

今人杨启樵(现任日本广岛大学文学部教授)在对《雍正朱批谕旨》作了长期研究后,在其著作《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专辞一章谈“清世宗与年羹尧的恩怨车鹞车葛”。根据史料,力排他说,提出独到见解。他认为:首先,胤禛题并未受年羹尧的钳制,因胤禛真继位极为秘密,手操京师兵权的隆科多,于圣祖(康熙)驾崩后翌日,即令六日内紧闭京城九门,故消息无法泄漏,更谈不上胤禛题挥兵争位受年扼。其次,既如此,年也并无拥立之功,故雍正杀年以灭口的杀知情者之说当然也不能成立了。恰恰相反,他认为从雍正朱批中,可发现很多雍正对年羹尧的赞语,如雍正二年闰四月十九日付德折朱批:“军旅之后,获兹膏泽,实乃大将军年羹尧忠勤之所感召。”又如稽曾筠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折朱批:“西海一事,岂人力所能者,皆因年羹尧能此二字,天下大臣,皆当法其心也。”(《雍正奏折》)更有在朱批中称年羹尧为忠臣、功臣、恩人的。且年在雍正二年入京觐见之前,与雍正并无个人私怨,雍正及在京百官均“极盼”与年羹尧这一功臣相见。然入京觐见不到两月,雍正即屡屡下旨严斥,何也?主要因年恃功自傲,妄荐亲信胡期恒为甘肃巡抚、岳周为西安市布政使、刘廷琛为广西布政使,滥参四川巡抚,致疑。雍正后曾有朱批“大凡才不可恃,年羹尧乃一榜样,终罹杀身之祸”(《雍正朱批谕旨》一函,石礼哈)。可见已招世宗猜忌。总之,杨启樵认为年羹尧被杀原因有三:一是世宗赏罚分明、功赏过罚,毫不留情;其次,世宗因派到年羹尧手下监视年的情报员被收买,大为恼火;其三乃是年羹尧骄横贪暴自致死地。结果“年羹尧自难逃越鬼门关,而多年来,却使世宗反蒙杀功臣的污名”。

海龄死因

海龄，满洲镶白旗人，郭洛罗氏。1841年初任京口（今镇江）副都统。鸦片战争是中华民族蒙受凌辱，国土始遭蹂躏的开端。英国侵略者为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841年8月以进攻江浙地区为重点，妄图控制长江下游的航道，截断清政府的漕粮供应，以谋夺更多的权利。1842年7月，几千名侵略军进犯镇江。镇江为大江钥匙，南京门户，漕运咽喉。两江总督牛鉴闻风逃遁，躲进南京。海龄率1700名士兵守卫镇江，敌我悬殊很大。但是，面对气焰嚣张的侵略者，海龄率领镇江守军奋起反抗，坚守镇江达7天，歼敌180余人，但由于种种原因，镇江最终失守，海龄死于镇江。如何评价海龄？史界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海龄是怎样死的？至少有4种不同的记载。

一、“为民戕害”或“为乱民所杀”说。1842年8月山东道御史黄宗汉上奏：“海龄闻系误杀良民甚多，以至被民戕害。”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写道：“英佯攻北门，而潜师梯西南入城，士兵仅斫其一二人，敌已蚁附，守兵皆溃。英先焚满营，海龄为乱民所杀。”民间抄本《夷艘入寇记》也有类似的记载。

二、“不知所终”说。无名氏《京口僨城录》中记：“城破后郡民纷传都统遁去。”夏燮《海疆殉难记》中“又有言都统开城逸去，不知下落者”。镇江之战另一指挥者、参赞大臣齐慎上奏，城破，“房屋多已燃烧。副都统海龄督帅旗兵堵击，身受重伤，旗兵伤亡不少。”“副都统海龄并城内文武官，均不知下落。”

三、“投火自焚”说。《英人强卖鸦片记》中叙述海龄死因较为详细，海龄对妻子说，今日之战，官军将恐不利，劝妻子趁北门起火，“混乱以逃”。妻子说：“许妾所为，君但督士卒，至死勿弃城。”说后，“掖小儿走于北门跃入猛火中以自死。海龄见之大怒，欲报妻子之仇，聚满洲兵四五十人，冲入敌中，殊死战，多杀敌兵，后海龄见兵寡，竟不可胜，因见北门火势未减，亦投其中，就妻子死所而死焉。”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写道：“满兵的副都统海氏在败了的时候，坐在家中一把椅子上，命令他的仆人点火烧房，故意死在火焰之中。”

四、“自缢殉节”说。《夷氛闻记》写道：“城上兵立溃，夷先放旗营纵火，城陷，海龄自缢殉节，其妻与孙并同时死难。”耆英奉旨调查后上奏说：海龄同其妻并次孙“皆在署内自缢尽节”。

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悬案！从材料上分析，“为民戕害”之说疑点最多。首先黄宗汉《奏海龄闻系误杀良民甚多被民戕害折》，一个“闻”字证明他的上奏只凭传闻，令人怀疑。其次，《道光洋艘征抚记》所说亦恐为传闻所误。1841年2月魏源曾为裕谦幕僚，参与浙东抗英斗争，但因清廷战和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数月后愤而辞归，镇江之役他不在场。其三，据耆英奉旨查明，引出这种说法，主要出自常镇周项中伤。周项身为镇江地方官，深怕镇江失守皇上追究，“惧于重谴，乃讪以误杀良民，被民残害等情。”耆英的调查当属实。当时京口人就恨周项诬陷都统，“乃编十字谣，揭之通衢”，卑鄙无耻往往与贪生怕死连在一起。开战前周项已被侵略者气势所吓倒，稟中说，“贼（指侵略者）势浩大，据我腹心，实已不能转动，若不早图和解，其祸变愈久愈大，不知穷极”，

主张不战自降，全部答应侵略者的要求。侵略者进犯镇江时，他惜命“托词不知何往”，当了逃将，“以致镇城内外，居民警惶”这种人中伤海龄不足为怪。

“不知所终”说，没有一条肯定的史料。《京口债城录》为镇江当世人所写，但撰者年老多病，一直在家未参战，文中对海龄“遁去”并没有肯定，是战乱中据郡民纷传随手而记。夏燮《中西纪事》卷中已肯定了耆英的查访，海龄“自缢尽节”为实情，对“开城逸去”之说并不认为属实。齐慎之所以云不知海龄下落，7月21日镇江失守前，齐慎会同海龄布防军务，坚守镇江，卯刻，齐慎“由正西迎上前敌”，激战中，据探报，侵略者“由间道往攻北门”，齐慎等人救援，结果“被逆夷由西南两门攻破”。齐慎率部分清兵退到越河口下，防英军再犯，与海龄再没见面，23日的上奏对海龄的下落当然不甚了了。

至于是“投火自焚”，还是“自缢尽节”？后者可能是实情。第一，《英人强卖鸦片记》为日本人所撰，不是战时的目击者，虽对海龄自焚场面写得详细，充满同情心，但必定是道听途说。更何况后来耆英在衙署里找到了海龄尸体，可见海龄并非死于北门火中。第二，宾汉是侵略镇江一分子，他的《英军在华作战记》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他对海龄坐在椅子上自焚身死的描写值得深思。海龄死应在城陷之后，当时衙署已被英军烧着，无需海龄命仆人点火烧房。宾汉这样写，有可能掩饰其入城后烧杀之行径。文中接着写道，第二天发现了海龄的幕僚，由他指出了海龄的尸体。这一天应为7月22日，齐慎六月十六日（阳历7月23日）上奏提到“副都统海龄并城内文武官均不知下落”，清军机处正是根据齐慎

上奏决定派耆英“迅即查明具奏”的。这应在宾汉等人发现海龄尸体之后。如是同一现场，这位幕僚为何只字未提海龄妻与孙的情况？这究竟是海龄的尸体吗？

极大可能是海龄“自缢尽节”死后遭火焚的。耆英在查询当中，从收集京口满兵内，领催扎明阿报告了海龄的原因，“据称城陷之时，海龄将堂印交印房骁骑校祥云(后投水死)，海龄随入内，同伊妻并19岁次孙皆在署内自缢尽节。”根据其报告，在衙署并获其尸并一妻一孙于灰烬中，“又拾得都统印信原著葛纱、袍襟、并伊妻所带玉环”，经丹阳县令金榕，京口协领武忠阿和海龄之子辨认，确实是海龄尸体。

上述说法，是否确凿，尚待进一步考证。

王鼎尸谏

林则徐曾写过一首《哭故相王文恪公》的挽诗，诗中有“伤心知己千行泪，洒向平沙大幕风”的沉痛诗句。这位故相王文恪公就是清朝道光年间的军机大臣王鼎。王鼎，陕西蒲城人，字定九，曾授大学士、太子太师。1825年，林则徐任江苏按察使时，王鼎又是当朝的军机大臣了。王鼎和林则徐非亲非故，为什么王鼎的死使林则徐如此痛心呢？

原来，王鼎“少贫力学”，“清操绝俗，生平不受请托，也不请托於人”，是一位“尚气节”的清廉汉族官员。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王、林虽共事极少，但在对英国利用鸦片侵略中国这一问题的立场上是一致的。王鼎不但赞同林则徐严禁鸦片的主张，还极力支持林则徐领导的抗英斗争，是严禁派在清中央的主要代表。